

邓小平曾强调中国不会输出革命

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本版选编三篇相关回忆稿件，以示对这位伟人的纪念。

近日，上世纪80年代中联部新闻发言人吴兴唐撰文梳理中共同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关系，该文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亚洲形势开始发生变化。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达成越南南北分治的协议。同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政党关系要服从于国家关系，中共随之调整了对亚洲国家共产党的政策。

1954年12月11日，毛泽东会见缅甸总理吴努。他说：“（一个国家）靠外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能输出。”他还说，中国决不会在云南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而且教育在缅甸的华侨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政党取得联系。中国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中国在印尼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

1955年12月，毛泽东同泰国代表庵蓬等人谈话时说：“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吴努总理害怕我们挑起缅甸共产党来反对吴努政府，我们说，我们只承认你们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有两个政府。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

1956年春，毛泽东和中央决定停止帮助其他国家共产党制订纲领和政策。

从1960年代“中苏大论战”开始后，中共对外工作受“左”倾思想影响，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向。

1963年6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又称《二十五条》），重新树起了“世界革命的旗帜，提出要坚决支持亚非拉反帝革命斗争。同时，批判了苏共以及意共、法共等的“和平过渡”思想。

邓小平一生都没有辞去职务

1987年4月20日，邓小平会见印度客人时曾回忆说：“宋庆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蒋介石叛变后，国民党内有两位女性是真正左派，一位是宋庆龄，一位是何香凝，她们一直同共产党合作。”

特殊情况下的奇特会面

上世纪30年代初，宋庆龄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七君子”等人，在抗日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将大批捐款、捐物送给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介绍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医疗队等前往解放区为八路军伤病员服务。1937年8月，中共领导的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他对于宋庆龄给予八路军的大力支援，深知其重要意义。

但直到1949年，邓小平才第一次与宋庆龄会面。这年5月底的一天，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个营进驻上海林森中路后，连长指定武康大楼对面一所宽敞房子，要排长带一排人去宿营。当敲门要进去时，却遭到了门房的拒绝。正当双方争执不下时，宋庆龄亲自下楼来，对战士们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陈毅）打电话给我。”5月31日，陈毅和邓小平（时任中共华东局书记）一起到宋庆龄寓所拜访道歉。按照中央指示，军管会下令：保存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从优供给宋庆龄的日常费用及实物。

1978年，邓小平访问泰国、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与新加坡

总理李光耀会谈时，李光耀

表达了对中国支持东南亚共产

党活动的担忧。邓小平强调：中

国不会输出革命，也不在任何

地方谋求势力范围。



▲1978年11月12日，邓小平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总理官邸举行会谈。

新华社发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共已开始着手纠正对外关系中左的倾向。

1975年，缅甸领导人奈温来访。11月12日上午，邓小平与他举行会谈，称：“我们一向认为，任何国家的革命采取外国的样板，不可能解决问题。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处理，这是各国的内政，是各国自己的权利，中国不干预。”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对外工作“拨乱反正”，打开了政党外交的新局面。首先，摒弃了“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主题。第二，明确了政党外交是“总体外交”的一个部分，重新强调“革命决不能

邓小平一生担任过许多党和国家要职，但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辞去的一个职务是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在任期间，他还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了基金会。

更深理解在几经波折之后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了，宋庆龄当选为国家副主席，邓小平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文革”开始后，宋庆龄和邓小平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回到工作岗位上不久，邓小平便致电问候宋庆龄，并与夫人和女儿一起到宋庆龄北京寓所探望。

1977年7月，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宋庆龄闻讯十分高兴，7月24日，她在致友人拉维那的信中说：“昨天晚上全城欢腾，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选举邓小平再度担任要职。”8月24日，宋庆龄接到邓小平紧急请求，要求面谈，她为此推掉了与廖梦醒等人的会见，专门等候这次谈话。与第二次复出之后去探望宋庆龄一样，邓小平的这次会见再次争取到了宋庆龄的大力支持。

1979年3月30日，宋庆龄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这次会上邓小

输出”。

1978年，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会谈时，李光耀表达了对中国支持东南亚共产党活动的担忧。邓小平强调：中国不会输出革命，也不在任何地方谋求势力范围；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内政，应由这些国家自己处理。

根据这一原则，中共跟“修正主义

政党”恢复了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政党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以及保守党发展党际关系，对“小左派”则逐步中断了联系。

对东南亚国家共产党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不再提亚非拉是“世界革命中心”，积极发展同东南亚国家民族主义政党，包括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的联系与交往。对于当时仍留在中国的少数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成员，则进行了妥善安置。大部分人员都回了国，或去了欧洲国家。希望留在中国的，则请其不要进行政治活动，安排其从事教学或社会工作。

据《中国新闻周刊》

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率先垂范支持小平改革

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7月28日，宋庆龄即在致中共中央建议信中，言辞恳切地要求辞去领导职务，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改革率先垂范。在解放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等方面，宋庆龄坚定拥护邓小平。在一些对外交往特别是接见美国友人的场合，她和邓小平一起出席，向西方世界表明了她的立场。

1981年，宋庆龄渐渐病重了。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宋庆龄入党和担任国家名誉主席的问题。3月30日，邓小平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宋庆龄，随后发出宋庆龄享受国家元首待遇的指示。5月15日下午，邓小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同时建议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16日上午，邓小平前来寓所探视，祝贺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宿愿，宋庆龄听后点头微笑。邓小平希望她安心养病，并说：“您如有不测，我们会妥善安排。”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在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她伟大光荣的一生。

1982年5月29日，为纪念宋庆龄同志，继承和发扬她的未竟事业，以“和平、统一、未来”为宗旨的宋庆龄基金会成立，邓小平担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

邓小平与“船王”包玉刚的友谊

回望历史，会发现在我国的三次命运转折处，都曾醒目地出现过“宁波帮”。

1916年8月23日，孙中山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对“宁波帮”推崇备至：“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1949年5月6日，解放军兵临上海，毛泽东在电报

对“宁波帮”，邓小平有相当高的评价。邓小平长女邓林说过，父亲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就对宁波人有深刻了解，知道他们精明能干，会做生意。

“宁波帮”中，与邓小平关系最密切的要算“世界船王”包玉刚。

中特别交代：“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团结这些资本家在上海与我们合作。”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向当时分管沿海开放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询问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



▲邓小平会见包兆龙、包玉刚父子。

进展，特别问到“宁波怎么样”，谷牧作了简要汇报。

“宁波的事情好办点，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谈话中，邓小平还讲了一句后来被广为传诵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正是邓小平重新唤回“宁波帮”的这句话，让沉寂已久的著名商帮和它的家乡再次为人瞩目。

邓小平对宁波情有独钟，大抵是因为宁波有改革开放的两个优势：“宁波港”的地理优势和“宁波帮”的人文优势。

对“宁波帮”，邓小平有相当高的评价。邓小平长女邓林说过，父亲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就对宁波人有深刻了解，知道他们精明能干，会做生意。

“宁波帮”中，与邓小平关系最密切的要算“世界船王”包玉刚。

1978年11月，在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包玉刚表亲卢绪章的牵线下，包玉刚

与邓小平在北京凛冽的寒风中第一次握手，一见如故，谈了很多问题。不久，包玉刚通过卢绪章表示：打算以其父亲包兆龙的名义向祖国内地捐款2000万美元，其中1000万美元在北京建一座现代化旅游饭店——兆龙饭店。

这可难住了卢绪章，因为当时中国一般不接受“外援”，更何况包玉刚是“大资本家”，他的钱该不该接受？卢绪章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相当于干脆地说：“别人怕接出麻烦，我出面接受这笔捐款。”并批示“请国家旅游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1985年10月25日，日理万机的邓小平还破天荒地出席了北京兆龙饭店的开业典礼。

1984年10月28日，阔别家乡40多载的包玉刚回到宁波，面对家乡人民的热情，吐出肺腑之言：“我是宁波的大使，宁波的事也是我的事。我愿为宁波的事跑腿。”

不到两个月，邓小平又在北京会见包玉刚，像老朋友一样谈了40分钟。包玉刚说：“宁波的面积是香港的10倍，人口也跟香港差不多，但还没有一所综合大学，我打算在宁波办大学。”邓小平笑着说，“我赞成”，

并答应题写校名。1985年10月29日，由包玉刚捐资2000万美元的宁波大学奠基。

此后，包玉刚几乎每年都要到北京接受邓小平的接见，他也成为邓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海外商人。1991年9月23日清晨，包玉刚因突发呼吸系统疾病辞世，时年73岁，邓小平以“生前友好”的名义送了花圈，并派女儿邓榕赴港出席包玉刚的葬礼。

邓小平动员“宁波帮”的号召和对宁波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海内外宁波人。他们利用各种途径、方式，为家乡建设献计献策，出资出力。除了包玉刚，还包括王宽诚、应昌期、顾国华、赵安中、李惠利、邵逸夫、李达三、曹光彪等“宁波帮”著名人士。

1985年，也就是邓小平提出把“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第2年，海外宁波帮人士向宁波捐赠折合人民币5700多万元，是前1年的37倍。

据《现代金报》